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特刊



中国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本报记者 徐惠喜



2013年,中国需要哪些必要而迫切的改革?在8日一场题为“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分论坛上,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马丁·杰克等论坛嘉宾就此话题展开了一番热议。

论坛主持人开场时向主席台上的4位嘉宾提出了一道即兴问答题:“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林毅夫称是“实现经济转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巴尔舍夫斯基的答案是“以新战略释放制度红利,实施城镇化战略”,樊纲则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推进城镇化”,马丁·杰克回答说是“经济结构性改革、反腐败”。

四位嘉宾的答案中均涉及改革。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国家面貌到

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国有近5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果说过去的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那么,今日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复杂的矛盾问题,中国更需要以改革激发出制度红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如何实现转型,人民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改革如何走出“攻坚区”和“深水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期盼的热点。

巴尔舍夫斯基和樊纲不约而同地都把城镇化看作是下阶段中国改革的优先领域。确实,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人均GDP水平在全球排名接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2%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当务之急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樊纲表示:“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几年后不是回到家乡,而是要在城里待下去,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这涉及户口制度改革。”林毅夫补充说:“全国只有35%的人口拥有城市户口,这意味着17%的人口,即约2亿人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

利。”巴尔舍夫斯基认为:“让更多人获得城市服务,能增加消费,这有助于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经济构成中,消费占比超过50%,而中国只有约30%,这意味着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西方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马丁·杰克指出,“中国的改革需要从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巴尔舍夫斯基呼应说:“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将来的经济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下一步要看能否把计划落到实处。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在顶层作出决定。”

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点、找准突破口,才能事半功倍。城镇化发展将会释放巨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是未来促进内需的战略着眼点,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能。

在谈到中国的居民储蓄水平时,中外嘉宾展开激烈的观点碰撞。巴尔舍夫斯基认为:“储蓄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需求,高储蓄率在一定程度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但中国储蓄率过高将导致金融压抑,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林毅夫显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他举了两个国外的例子予以回应:“在亚洲,新加坡是高储蓄率国家,其经济运行被公认是健康的。在欧洲,德国的储蓄率水平也较高,其经济状况同样无可挑剔。”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引领中国巨轮穿越难关险滩,驶向全面小康的彼岸。改革只有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才能让更多的人得以分享红利。改革红利不会自动变现,以真抓实干的精神推进制度创新,以造福人民的使命感承担历史责任,就一定能有更大作为、更多进步,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就难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来实现。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呼吁

亚洲加强基础设施合作

本报海南博鳌4月8日电 记者徐惠喜报道: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曾培炎今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复苏与亚洲的共同发展”分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呼吁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强合作,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曾培炎指出,越来越多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开始敏锐地抓住了结构改革与确保增长这两大难题的交汇点,即扩大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市场需求的放缓将会持续相当时间,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亚洲经济必须尽快转型,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使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结构调整,催生新的产业门类,就成了加快结构调整,同时确保增长与就业的必然选择。

曾培炎表示,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先行,而且先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联网成片才能实现效益和功能的最大化。为此,曾培炎提出了“亚洲基础设施合作倡议”并指出有两项工作必须着手进行:一是开展各经济体之间基础设施规划的交流合作,把各自的基础设施开发规划,同推动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二是为了解决亚洲各国和地区基础设施开发的巨大融资缺口,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多边金融机构或基金,作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平台。

曾培炎强调,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推动本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使之互联互通,则是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倡议的落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仅要有宗旨和原则,还应有切实可行的路线图,这需要大家共同的智慧。



图① 4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经济转型与楼市调控”分论坛。

新华社发

图② 博鳌亚洲论坛举行“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分论坛。

徐惠喜摄

图③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粮食安全:亚洲携手 共同面对”分论坛上发言。

新华社发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须注重文化融合

本报海南博鳌4月8日电 记者连俊报道:在8日举行的“海外并购、走出去与国际化”论坛上,与会嘉宾对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规模不断上升十分关注。嘉宾认为,适时收购低价而优质的海外资产、品牌、技术,对于转型之中的经济体和企业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为并购行为和并购后管理带来更多的风险。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表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近几年有

较大扩展,主要源于四方面原因:一是经过近10年的海外投资尝试,最近到了增长的爆发点;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吸引投资,过去不太成熟的投资机会现在都成熟了;三是中国本土很多企业具备海外投资意愿;四是很多中国企业希望实现业务多元化发展,寻找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希望在海外市场建设制造业基地。

嘉宾表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历程

中,必须明确自身目标,详细了解投资对象的情况,对于投入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而言,要特别注重与并购企业之间的文化融合。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指出,金融企业通常采用并购、建分支机构以及同境外机构合作等方式。这其中最大的难处,是与当地或并购对象的企业文化融合问题。马蔚华举例说,在全世界的并购实践中,成功的案例只有30%,失败居多的原因是文化的整合不到位。

粮食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今年首设农业议题,并将主题定位为“粮食安全:亚洲携手共同面对”。8日上午举行的这场圆桌讨论会,嘉宾围绕“粮食安全挑战与应对”、“国际合作与粮食安全”等题目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并传递出携手应对粮食安全的声

中国粮食安全有保障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粮食安全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此向世界表示,中国有能力和信心保障粮食安全。

韩长赋指出,受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等因素影响,世界粮食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区域性紧缺进一步加剧,国际粮价高位剧烈波动,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长期以来,亚洲各国和地区致力于发展粮食生产,减少饥饿人口。但受历史、自然、经济发展等条件制约,亚洲目前仍有5.6亿人吃不饱肚子。

世界粮食安全挑战严峻

博鳌传出携手应对呼声

本报记者 牛瑾

韩长赋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把解决好13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小麦等三大主粮自给率达到98.1%,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将坚持走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的科技进步。”韩长赋坚定地说,“未来中国有信心、有能力主要立足国内来保障粮食安全。”

一颗种子可改变世界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除了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重视种业的发展。”海南省副省长陈志荣在圆桌讨论上说:“目前中国有30个省份的500家科研单位近5000名育种人员在海南从事工作,育种面积达到20万亩,应该说在保障国家的粮食和种业安全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有专家说,种子对农业的贡献率高达30%,这也就不难理解“一颗种子可改变世界”的说法。陈志荣表示,海南省提出了南繁基地正规化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建设好南繁育种科研区和制种区等”。

在圆桌讨论会上,作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用一系列数字阐述了种业对于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现在全球的水稻面积是1.5亿公顷,每公顷年产4吨,我们的杂交稻有1700万公顷,在我国平均产量是7.5吨/公顷,占水稻总面积的58%,杂交稻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养活7500万人口。”

“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的水稻种上杂交稻的话,所生产的粮食会有1.5亿万吨,可以多养活4亿至5亿人口。”袁隆平表示,希望通过各级政府、组织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为解决全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粮食安全需要亚洲合力

在圆桌讨论会上,众多讨论嘉宾表达了同一个观点: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需要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参与。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10+1’上合组织等农业部长会议,加强区域粮食安全的协调;与亚洲相关国家共同建立了‘10+3’大米紧急处置机制;帮助印尼、柬埔寨等10多个国家建立了优质高产农作物示范基地,示范品种及组合240多个,推广面积接近80万公顷,增产幅度平均在30%以上;帮助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开展跨境的动植物疫病防控,为稳定亚洲的粮食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韩长赋表示。

韩长赋呼吁,亚洲各国和地区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粮食安全。“加大在国际及区域组织中的协调力度,提升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开展农业多双边合作,相互学习借鉴农业政策法规、实用技术和先进经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公平合理、持续稳定的农业贸易秩序。”

“泰国一直在加强技术研究来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关注环境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使农业生产做到可持续发展。”泰国副总理兼农业和合作社部部长昆昆·林岚通表示,必须通力合作采取更多的方法保障粮食安全,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11指的是二十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南非和

本报记者 李红光

土耳其。受外需急剧下降和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E11中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但整体增速仍然高于发达经济体。

2012年E11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延续了2011年的上升态势,无论是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名义GDP还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不变价GDP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其中,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比重按市场汇率计算达到9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50%。

但是作为开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深受国际经济增长乏力的国际大环境影响。在外需不振、内需不足、金融市场动荡、物价水平起伏、经济增速放缓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新兴经济体在实现经济稳健、可持续、均衡增长方面将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报告认为,E11各国经济呈现出以下

特点: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财政平衡能力较好,公共债务负担较小;国内通胀压力缓解,实际汇率分化;就业压力总体趋缓,结构仍有调整空间;经常账户趋向平衡,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利率水平徘徊,证券市场企稳回升。

在对外经济合作上,尽管发达经济体仍是E11主要的贸易伙伴,但E11内部联系日益紧密,贸易额继续扩大,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数据显示,2011年E11内部贸易额与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为23.85%,比2010年提高0.4个百分点,201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4%,E11内部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此外,根据一些知名机构的竞争力排名,2012年E11各国仍是世界上较具竞争力的国家,并且部分国家上升势头显著。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2012年E11中有6个国家的位次比上年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阿根廷和印尼,分别上升了9个和4个位次。同时,E11各国企业实力提升迅速,在全球500强企业排名中新晋企业数量增加,多数在榜企业名次上升。

报告认为,受发达经济体经济现状、贸易保护主义、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区域安全问题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经济将维持中速增长,并在未来几年成为常态。但在全球层面,新兴经济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版编辑 梁图强 李红光

版式设计 邵颖